



秦征南越论稿



林岗著

南方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林
岗 著

秦征南越论稿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 合编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征南越论稿 / 林岗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 4
(岭南文库)

ISBN 978-7-218-11681-5

I. ①秦… II. ①林…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秦代 IV. ①K23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6974 号

Qinzhengnanyue Lungao

秦征南越论稿 林 岗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谢 尚

责任技编: 周 杰 易志华

装帧设计: 亦可文化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 www. gdpph. com](http://www.gdpph.com)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70mm 1/16

印 张: 16 插 页: 6 字 数: 141 千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9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ISBN 978-7-218-11681-5



9 787218 116815 >

岭南文库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幼军 卢钟鹤 叶选平 朱小丹 刘斯奋
杨资元 李兰芳 吴南生 张汉青 林 雄
钟阳胜 黄 浩 黄华华 庾 震 雷于蓝
蔡东士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编：慎海雄

岑 桑 (执行)

副主编：顾作义 朱仲南 曾宪志

陈海烈 (执行)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桂科	卞恩才	卢子辉	卢家明
白 洁	司徒尚纪	朱仲南	刘扳盛
杜传贵	杨以凯	李达强	李夏铭
李锦全	肖风华	岑 桑	何祖敏
沈展云	张 磊	张伟涛	张荣芳
陈泽泓	陈俊年	陈海烈	金炳亮
郑广宁	胡守为	柏 峰	钟永宁
钟庆才	饶芑子	洪志军	顾作义
钱永红	倪 谦	倪俊明	黄小玲
黄天骥	黄尚立	曾 莹	曾牧野
曾宪志	慎海雄		

《岭南文库》前言

广东一隅，史称岭南。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千百年来，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

进入 19 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下了无数彪炳千秋的史诗。业绩煌煌，理当镌刻青史、流芳久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国社会跨进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置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十年艰辛，轰轰烈烈，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岭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锦簇，硕果累累。

际此历史嬗变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岭南、研究岭南，回顾岭南的风云变幻，探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岭南。我们编辑出版《岭南文库》的目的，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地，并帮

助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高瞻远瞩，继往开来。

《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并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亦在选辑之列。

《岭南文库》书目为 350 种左右，计划在五至七年内将主要门类的重点书目基本出齐，以后陆续补充，使之逐渐成为一套较为齐全的地域性百科文库，并作为一份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在祖国文化宝库中占一席之地。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元旦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二章	秦并六国后的南方疆界	14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船舶、水运和水战	25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治水工程	44
第五章	先秦岭南交通与秦征南越的战略	66
第六章	灵渠严关秦城与秦人的征战历程	99
第七章	遣戍与“和集百越”	131
附录一	历代严关文献及沿革考	174
附录二	秦征南越史料	195
后 记		244

第一章 绪 论

秦征南越发生于距今二千二百余年前，传世史籍留下的记载几乎不足以勾勒这场伟大征服的轮廓。本纪用来记叙帝王功业大事，但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并无只字提到征战及其准备，只有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和三十四年（前213）的纪事中提到掠取的百越疆土和征兵遣戍。既不及前一年北逐匈奴取河南地为详细，更不如三十五年（前212）“焚书坑儒”事件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楚。史家关注铁血统治留下的痛苦记忆显然多于国家成长本身的历程。然而打开历史地图一阅，征南越所开辟的南海、桂林、象郡，其土地面积包括今广东、广西、贵州的一部分和今越南的一部分，合起来接近公元前一世纪恺撒征高卢所取今法国面积的全部。由此一武力扩张，史籍称为“北户”的这岭南地带，彻底归并中原王朝，中原文化得以在这片南蛮乡土迅速扎根生长，黄河、长江、西江三大河流域由此在政治上连成一体。它对华夏文明生长、壮大的深远意义，要在其后的日子

才显明出来。

由于史籍的湮灭和年代的久远，后人在谈论到这场规模不小的征战时不但细节无处着落，重要之处不清楚，甚至连我们究竟怎样定义这场征战，也存在可商之处。千百年来的岭南岭北共处同一天空的共同生活已经塑造了我们对版图的固定看法，以为征战得来的南海、桂林、象郡理所当然本来就属于中原版图。例如张荣芳和黄森章认为这场战争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战争的组成部分”。^① 其实“统一”与“分裂”，在中国王朝历史上有特别含义。有“分裂”才有“统一”。原来同属王朝管治下的部分疆土，被裂土分治，但语言、文化、经济还维持着关联，这就是史称的“分裂”。时移世易，分治的“小朝廷”被荡平，王朝政局重归于一，这叫做“统一”。岭南地带自春秋战国以来，皆被视为中原化外夷蛮之地。虽有贸易、文化的往来与影响，中原的政治势力却从未逾岭。战国时代，楚国与岭南地带最为接近，但楚国南向的攻势仅止于湘江流域，而政治、军事进取的重心当然放在北向争霸。中原的政治、军事势力既然从未逾五岭，没有“分裂”的存在，自然就不存在“统一”了。以秦征南越为“统一中国”^② 的战争，这似乎欠缺周详。也可能是因为现代殖民主义臭名昭著吧，使得

^① 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第4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学者谈论到自己历史的时候，回避国家规模成长扩张过程中的殖民问题。其实，笔者以为大可不必。

任何地缘政治实体都存在能量外溢的现象，这是地缘政治实体的通性。除非它的内部能量不足以支持它将自己的本性付诸实施，才会打住过和平的日子。就像一个水杯，在装满之前它绝对不会外溢出来，但到了装满的临界点，若是还有更多的水源源不断涌出来，那它不可避免就要外溢出来，任何人都不能阻止这个趋向。这也有点像处于发育期的孩子，身体不断成长，它就自然需要占用更多的空间，往外伸展。只有到了发育期结束，这种占用更多空间的趋势才会停止下来。当然，一个国家并不是在它存活的任何时期都表现出能量外溢的行为，而只有处于它的内部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支持扩张的时候才会表现出能量外溢的行为。在历史上，我们观察到大量这类例子，以致我们将能量的外溢当作国家这种地域政治实体的本性。这或许不中，但相信不会离事实太远。当国家间发生能量外溢行为的时候，通常意味着发生战争。政治实体的这种通性本诸人类的天性，如果说人类是天生具有攻击性的生物的话，那国家演化出来，就是在极尽可能的范围内扩大了这种生物性的攻击本能。单独的个人只能单打独斗，而组织起来的人群则可以进行群殴。更进一步，在国家这种文明演进的高级框架内，人类则只有更残酷的选择，这就

是进行相互之间有组织的战争。有史以来数千年的文明史是一部人类的战争史，这个看法虽然未必能囊括人类历史活动的所有方面，但至少指出了其中最基本和最血腥的那种人类活动的面相。战争与地缘政治实体组织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战争催生了国家，而国家因其能量外溢的趋势把战争带向更大规模。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万物之父”。^① 如此说来，战争与国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些国家在战争中衰落了，一些国家通过战争疆土更加辽阔，力量更加强大。国家边界由于战争而变动，国家规模提升的同时也提升了战争的规模。大国之间，战争中两军对峙，万箭齐发，万马奔腾冲杀的震撼景象，亦远远超出人的一般想象力。

秦征南越很显然是开疆拓土的殖民扩张行为，秦始皇与比他晚一个半世纪的恺撒在通过征战扩张国家力量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两样。秦王朝和罗马帝国都是组织成熟而且规模巨大的国家，都在国家力量上升期向外扩张，而且对手与之相比，组织、规模、力量都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南越人与高卢人一样，其时处于部落阶段，各不相统属，各部族盘踞于一相对狭小的地域范围。面对强敌，虽勇气可嘉，顽强抵抗，怎奈形势比人强，抵抗过后便不得不臣服于强权之下。贾谊《过秦论》所讲，

^① 《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评注》，第71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百越君民，“俛首系颈，委命下吏”。揆诸情理，虽有夸张，亦当离事实不远。秦征南越与恺撒征高卢，大的范畴虽同属殖民扩张，但征战的结果却大有不同。恺撒意图谋取高卢的人口与财富，征战过后，皆大事劫掠金银财物，俘获人口贩卖为奴隶，输送罗马境内的种植庄园。这与一千五百年以后的欧洲海外殖民扩张，如出一辙。秦始皇征南越，志在什么呢？《逸周书·王会解》提到南方百蛮给中原进献的远方宝物有“珠玕、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鹇、短狗”。^①

今天能辨识的诸物中，珍珠、玳瑁、象牙、犀角、翠羽等，确实只有沿海才有，或岭南比岭北更多。但这些都是珍稀宝玩而不是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淮南子》作者即认为秦征南越，志在“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玕”，以为意图取得这些珍稀宝玩，秦始皇发动了这场征伐。然而，我们知道古代所谓“进献”，常常就是“贸易往来”的另一称谓。中原贵族即便需要这些珍稀宝玩，也不必兴师动众、劳师远征，而通过两地贸易就可以得到。《淮南子》作者的猜测显然缺乏说服力，从帝王贵族生活奢靡的事实中臆测征南越的动机，这是不准确的。

秦始皇并吞六国而又二世而亡，大成的功业和急速的败亡都发后人深思。西汉前期的思想文化氛围便是沉

① 见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第333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浸在反思暴秦失政之中，贾谊的《过秦论》是其代表。贾谊的反思指向秦王“贪鄙之心”，秦政不施仁义而以“诈力”暴虐天下。如果“贪鄙之心”说的是人性，那还说得过去；如果特指秦王，那看问题的眼光就过于道德化了。历代帝王，何人缺少“贪鄙之心”？汉高祖之后史称“文景之治”，两代帝王以简朴勤政闻于天下。今汉景帝的阳陵已发掘其中一部分，出土的仕女、仆从的陶俑以及猪牛羊狗的陶俑成千上万，墓道坑里罗列成片，不计其数，而这仅仅是其中少部分已发掘墓道坑的陪葬品，更多的尚待时日。以其对地下生活的想象来推测当年的地上生活，奢华程度一定令人咋舌。从中也让我们看到了“文景之治”的另一面，看到简朴背后的“贪鄙之心”。广义地说，指责帝王“贪鄙之心”影响历史进程，这并没有错，但把它落实为一个具体事件的决策动机，这是没有真知灼见的。也许是西汉前期的思想文化氛围影响了《淮南子》作者，使之作出秦征南越志在贪图珍稀宝玩的判断。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北逐匈奴和三十三年（前 214）南征南越，虽然都是征战，但含义大有区别。匈奴人是游牧民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行国生活，到了寒冬朔风劲吹，牧草枯黄的季节，四出劫掠是其固有的生活方式。这对农耕而定居的华夏民族形成极大的威胁。华夏与西北诸民族的长期拉锯战，皆因农耕与游牧的对峙

而起。战国末期，匈奴逐渐强大，至秦始皇定鼎中原之时，已成为秦的心腹大患。除了六国贵族反叛的内忧，匈奴则是秦王朝唯一的外患。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并天下，二十七年（前 220）即北巡陇西、北地，又治直通两地的“驰道”，兼派最能征战的将军蒙恬，将三十万军守陇西、北地和上郡，又派太子扶苏在上郡监军。上郡的治所即今绥德，是当年西北防务的大本营。扶苏墓就在绥德老城疏属山的山顶，笔者 2013 年到访其地，尚存一小凉亭和明代重修的旧庙。蒙恬墓在城外，坐落在一中学之内，大部分被侵占，只余墓碑依稀可辨。大将军与太子都布置在国之北境，可见当时形势的严峻。秦王朝甫建立就要面对西北境游牧民族的安全威胁，秦始皇决心北逐匈奴，应当是既定的国策。但是南征南越却不能作这种理解。五岭以南的百越南蛮，既然各部族不相统属，社会发展的程度与刀耕火种不相上下，连方国的水平尚且不及，何来力量“北伐”而威胁秦的南境？在秦的南部边界线，可以说不存在任何安全的威胁。这可以从史籍没有南境驻军，没有南疆戍守的记录得到印证。北边匈奴是秦朝的“硬骨头”，北逐匈奴是啃“硬骨头”，对秦朝而言是不得不然。而南蛮百越则是秦朝的“软柿子”，南征南越等同于捏“软柿子”。“软柿子”可捏可不捏，问题是秦始皇为什么要捏？

答案首先是秦有足够的实力去捏“软柿子”。如上文

所述，既然强国存在自然的倾向去扩大自己势力范围，将自己的军事力量、经济、文化向外投射，为自己创造更大的利益。秦朝新立，兵强马壮，众多赋闲将军缺用武之地，而南取百越，一试身手，有何不可？当然这仅仅是一般的事理推断。事理推断落在实处，还得有具体的史料线索。就笔者目力所及的史料，直接的记载阙如。笔者以为最有价值的间接线索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的有关记载。虽然没有直接讲到南征的决策动机，但前因后果耐人寻味。秦始皇并吞六国之时，即有足够的自觉意识，明白自己“千古一帝”的历史定位。侯生、卢生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①于是寻求天意的“验证”，是他日后统治生涯的题中应有之义。他一生五次出巡，既有巡视西北边务，又有明察暗访六国贵族；既有访仙求道，取不死之药，又有勒石颂德，求扬威后世。其中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的出巡，以兴发而始，以兴败而归。这番扫兴的经历，或许直接引发了这位刚戾自用的皇帝拿南蛮百越出气，捏一捏这“软柿子”。这趟东巡他带着文官武将，“上邹峰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

^①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本书引用《史记》，均采用中华书局2014年“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后文不再一一注明。

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①秦始皇这一趟泰山封禅兴致甚高，连下山中途暴风雨不期而至，都被理解成吉兆，挡雨的大树被封为“五大夫”。从泰山下来，“过黄、腓，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又“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琅邪石刻有得意之句，其中不无虚夸之词：“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随行群臣也一齐发出颂圣的声音，以为古之帝者比秦始皇差得远了，“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跟着，齐人徐市上书，谓东海三神山仙人居之，有仙药，遂命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草。东巡到此为止，一路顺利。

然而接下来的归途则大大的扫兴。原因是秦始皇突发奇想，打算寻访已经失落人间的周鼎，用事实证明自己得到统治天下的“天意”。

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

^①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本段下文引用均出此篇。

伐湘山树，赭其山。^①

自陶器时代以来，本为炊器的鼎在黄河流域的文化中逐渐附上隐喻的意义，象征国家权力。又据战国时萌生的五德始终说，秦人自认水德。秦始皇扫平六国，代火德的周而兴。周鼎沉于泗水，或是当时传说，或是迷信五行相克之说。总之，在秦始皇眼里，泗水能出周鼎，则代表着“天意”恰好降临在自己身上。彭城即今徐州，泗水穿城而过。遑论周鼎是否沉于泗水，以今人眼光看，秦始皇的这个举动赌注下得太大。万一不成，即赔上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泗水捞鼎”，随之成为汉代画像砖、画像石的流行题材，就证明汉人利用此故事大做文章，讥刺秦人得位不正，反证自己继周而王，秦不过是“闰统”。秦始皇之所以冒险一搏，盖因他的迷信心重，认为天意在自己一边，为人又刚戾自用，东巡的一路顺利，群臣颂德，刺激他头脑发热，遂有泗水捞鼎的可笑举动。但秦始皇还是虔诚的，他既“斋戒”，又“祷祠”，工夫做到十足，无奈周鼎就是不出。司马迁叙述此事，用了一个“乃”字，笔者以为是暗示下文“西南渡淮水”是一个临时决定，本不在东巡预定线路之内。因为西南渡淮水即进入衡山郡，即今大别山区，路途崎岖不好走。如果不是出于一个特别的原因，没有什么必要选择穿越

①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